

# 主体的能动性与作用限度分析

申 锋

(中国矿业大学 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主体的能动性与作用限度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人们关注和想解决的焦点问题,主体要想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由,必须对其能动性与作用限度进行全面而合理的认识。通过对主体能动性与作用限度的发展衍化进行梳理与分析,从而找到如何协调能动性与有限性的方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主体;能动性;作用限度;发展衍化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80-04

## 一 概念厘定与提出问题

在哲学上,“主体”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从字面上来看,主体与客体是相对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把主体简单地排斥在客体之外,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认识,后者都是作为前者的研究客体。

多尔迈在《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中,开篇就写到,自文艺复兴以来,主体性就一直是现代哲学的奠基石,但现代主体性往往培育一种别具一格的个体主义,它把自我作为理论认识的中心,又把它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这就使现代主体性具有了人类中心论的“自我性的”和“占有性的”内涵。<sup>[1]</sup>他已经从对“主体性”的骄傲之中清醒过来,开始发现到了“主体性”的“黄昏”。那么,我们就能够这样来理解“主体性”的含义:它是人(主体)的能动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就像人作为人本身就是天使与魔鬼的统一一样,既在进行善的创造,又在给自己挖掘坟墓,如同荷马的诗中写道:“可耻啊,我说!凡人责怪我等众神,说我们给了他们苦难,然而事实却非这样:他们以自己的粗莽,逾越既定的规限,替自己招致悲伤。”<sup>[2]</sup>虽然说主体性在人类所特有的能动创造性的认识事物和改造事物的主体能力这方面的含义占的多些<sup>[3]</sup>,但是主体性的作用限度仍旧存在。

下面从历史的角度对主体的能动性与作用限度问题的发展衍化进行论述,最后提出处理好主体性内在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种可能性方法。

## 二 主体能动性的提出:迷雾中的晨光

### (一) 主体性的肇始

主体能动性的发掘是古人在哲学的沉思中得来的。古代哲学超越原始神话传说和宗教关于世界神创的观念,力图从世界自身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古希腊罗马哲学家通过对世界本原的探讨,从

自然界中概括出“水”、“土”、“金”、“火”等客观的物质作为本原,实际上他们都在力图证明世界的统一性,追求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解释和终极存在。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对世界统一性问题的探讨并非仅仅出于人类的求知本性,其中隐含着更为深刻的人类对于自身主体存在的关注:他们正是通过对世界的“本原”或“本体”的终极探寻,从而间接地确定人类本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和意义。

### (二) 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sup>[4]</sup>这个哲学史上的著名的“普罗泰戈拉命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主体性”思想的最初萌芽,第一次将人的“自我意识”从幕后推到前台。

在普罗泰戈拉看来,作为万物尺度的人是感性的、个体的人,对万物的感受是不同的、多元的、变化的,因此,并不存在一个万物的共同本原和始基。本体论问题就没有了讨论的必要,神和物的本体地位被取消,而人作为万物存在与否的标准和依据的主体地位便得以确立。所以后来黑格尔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因此也就是一般的主体。”<sup>[5]</sup>

普罗泰戈拉强调感性当然存在缺陷,当人代替了外部存在物而成为了世界的中心时,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关注,但这是以取消了事物的客观存在、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旧不能抹煞其至伟的功绩:在其他哲学家们着重于从自然、宇宙本身来探讨世界的本体,从自然事物的因果联系入手研究世界的统一性的根据的时候,普罗泰戈拉则将自然哲学家们据以立论的感觉经验拎出来加以拷问,揭示出知识对个体的相对性,并从人本身出发,高扬人的自我意识,揭开了人在自然、在神的压迫下抗争的序幕。

收稿日期:2010-05-02

作者简介:申 锋(1987- ),男,安徽灵璧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三 主体能动性的迷失:由先验本体到上帝

主体的能动性被普罗泰戈拉提出之后,本应该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物质生活极为困乏的时代,在人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自己所想要的物质时,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寻找一个超验的神给自己以精神上的慰藉,经过希腊三哲与中世纪的发展,超验之神已扎根于人心。

#### (一)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先验本体

苏格拉底摆脱了智者学派把人看作是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物这一观点,认为人并非是普罗泰戈拉眼中的受自然欲望和肉体感受驱使的感性存在,而是一个具有普遍精神的理性存在。苏格拉底强调人要“认识自己”,人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但是,这里的“认识你自己”只能以对象性的方式来认识,“自己”被降为了认识的对象。人的缺席必然带来神的登场,因此,苏格拉底最终还是在人之上提出了理念的“神”:神统治世界,神的权利是绝对的。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他把“理念”进一步普遍化、本质化。他认为,理念并不像苏格拉底所说的仅限于道德领域,也并不仅仅是思想的范畴,而是独立存在于事物和人心之外的。这样,精神的理念就成为世界的最高本质,成为感性世界的基础和依据。理念不存在于可感世界之中,但却是真实可靠的、恒定不变的东西。可感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仅仅是因为“分有”了与其同名的理念才得以是其所以“是”,我们感官所接触到的事物并非真实存在,不过是理念的“影子”。

从“分有说”和“模仿说”直到“宇宙生成说”,柏拉图逐步把理念这个本原注入了神圣性和神秘色彩,也消解了苏格拉底在为“善”之路上的主体主导性,将人置于客观精神的完全统治之下,本原的神圣性与超越性也就越来越造成对人的存在的优先性和压迫性。后来,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人的主体性更异化为主体所不可企及的超验的神性,神、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人成为上帝的产物,人把自己的主体性完全交由上帝掌管。

#### (二) 中世纪:人是上帝的奴隶

中世纪生产力的低下,无穷的战祸和罪恶,自然的严酷,等级制度的森严,使得人们看不到现实生活的希望。在这种条件下,人不再对自己的力量感到满意,转而寻求一种人格化的神的帮助,基督教神学便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有时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

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sup>[6]</sup>基督教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彼岸世界的美好,给人以一种向往和寄托。在基督徒看来,人在现实生活本身就是痛苦和无聊的,惟有通过精神的沉醉才能获得永恒的福祉。

在这里,上帝作为自然之外的神秘力量被赋予了绝对权威,封建神权统治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人也就成为了上帝的婢女。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人类把自身的命运完全交给“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的身上,人们只能顺从和遵循上帝的旨意,没有反抗的自由。

当上帝作为救世主出现了的时候,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就被异化为了神与创造物的关系:人从属于神,人的本质异化为神的本质。这样,衡量人的发展程度的标准,就成为了看上帝对所关怀的程度的表现,而不是看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自己的本质力量。这就注定了在中世纪主体不可能是自由和发展的,而只能是神、上帝对主体的奴役。

### 四 主体能动性的高扬:科学与理性

中世纪末期,对上帝的绝对信仰终于被打破,科学与理性的萌发使得对上帝的信仰不再盲目。科学与理性之光把人的潜能最大化地释放出来,真正地达到了一个主体性高昂的时代。

#### (一) 理性的宣扬

文艺复兴之后,以人为本的提出,对人的理性的高扬,重新将人类自身从天国降到了尘世。经过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实验科学的发展,人的异常强大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类理性的权威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了逐步确立,人们坚定地相信人类理性的伟大,确信可以通过主体自身的教育和文化进步而获得幸福。因此,“知识就是力量”被提出,“我思故我在”被赞扬,“天赋人权”观念被普遍接受。特别是笛卡尔,提出了对以往的知识来一番普遍的怀疑,而惟独不怀疑“我在怀疑”,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否定传统观念的批判革新精神和理性的自信。所以黑格尔高度评价说:“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sup>[7]</sup>

后来,这种自我精神的又发展为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康德彻底去除了把“自我”当作物看待的传统,突出自我认知的主体性,把自然当作我改造的对象。在人的理性和自然的关系上,不是自然牵着理性走,不是理性到

自然中去寻找法则,而是理性为自然树立法则。到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后,思想便成为一切事物的本质:绝对精神既有客观性,又有能动性;既是创造本体,又是认识本体。

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我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赋予了主体性先验的维度,他们都视主体自我为思维的当然前提。这就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对人的重视,发挥人自身的能动作用,采取普遍怀疑的精神,坚持实践至上的原则,把自己实践所得来的经验当作自己的知识来源。

## (二) 科学的力量

以理性原则作为基础的普遍怀疑精神不仅是17世纪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而且也是那个时代科学思想的基本特点。人们在理性的指导下,怀疑一切,注重实践得来的知识,使实验科学最终得以确立。与中世纪仅仅只有空洞的形式逻辑和神秘的信仰的经院哲学不同,实验科学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之下,产生了粗犷遒劲的阳刚力量,最终把上帝变得十分猥琐,不值得人去尊敬和崇尚。在怀疑精神的指导下,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日心说”、哈维血液循环学说、牛顿力学体系得以建立。这一切自然科学的新成就都建立在与抽象的玄思相对立的实验基础之上。

相信人的力量,对人的理性的提倡,让主体的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挖掘。而在科学和理性得到弘扬的前提下,自然秩序和人类天赋的观念也成为一种深入人心并不断推动社会前进的两种重要力量。人们相信能够在宇宙混乱不规则的表象之下发现秩序,而人本身的“天赋”——理性,只要通过健全的教育就能够从隐没不彰中凸现出来。

## 五 从追求自由到失去自由

科技理性不仅把自然变成了科学技术可以控制的领域,更消解了“上帝”的存在。既然上帝不再神秘,那么我们还信仰什么?我们只需要信仰自己,追求自我的享受和幸福。这样,在消解了外在化的神圣教条的束缚之后,人的感性欲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由此导致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人与人的重重矛盾。恩格斯给我们的警示越来越显得那么现实:“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sup>[8]</sup>

## (一) 科技的灾难

自然科学兴起之初,人们也许只看到其好处,因为它为人类的福祉展现了光明的希望,科学的勃兴让自然显得相形见绌。但是,在20世纪,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却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相信通过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世俗世界并过着自由、富足、有创造力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现实世界却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平衡的大灾难边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量子论、相对论和核物理学三大分支为主流的现代物理学体系形成,而原子能的威胁却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与日俱增,就在今天,核武器的阴影仍旧让很多大国的政治家头痛。另外,基因工程产生的人类传统伦理关系的颠覆、电子计算机技术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能源技术开发中的环境污染与破坏、高科技含量的广告让人们成为丧失自由个性、生活日益单一化的纯粹消费者,如此等等,都使我们感到了深重的危机。人类在利用科技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却使自己异化为科学技术的手段,正如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所说:“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sup>[9]</sup>

## (二) 主体的焦虑

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主体,人在交往过程中,往往产生恶性竞争、认同危机、身份焦虑的精神困境。孤独、冷漠、断裂、危机、虚无、恐惧弥散于心理的每个角落,主体的焦虑体验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似乎就是蒙克《呐喊》中的那个蒙着耳朵作恐怖地喊叫的人,充满了恐惧与孤独,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主体的焦虑被普遍化,焦虑广泛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弥散性的心理体验。从克尔凯郭尔的“孤独的存在”,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就是焦虑”,再到萨特的“他人即地狱”,都论证了这一点,特别是海德格尔,亲眼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痛苦,看到了科技对主体人的伤害,看到人在战争状态下的恐惧、孤独和无助以及人在遍布着分离、差异、流散、危机之下的深深的焦虑,从而提出了主体具有有限性的结论:“对人类理性来说关键在于,不要去排除能够、应当和可以,因而不要去扼杀有限性,相反,恰好要意识到这种有限性,以便在有限性中坚持自身。”<sup>[10]</sup>

## 六 结语:解决主体性内在矛盾的方法

主体的能动性与作用限度两者之间的矛盾似乎自古至今都没有解决的好办法,主体要么是被上帝所禁锢,一切惟上帝马首是瞻,要么就是破除迷信,把上帝的威信扫除,从而建立起彰显自我的主体的社会。前者的结果是主体成为上帝的奴仆,人匍匐在神的脚下;后者的结果是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随心所欲地支配自然。

历史上不少的哲学家也提出了协调二者矛盾的办法,海德格尔就在自己界定的技术世界和艺术世界中,选择了艺术世界作为人生存的终极目标。他认为技术世界是在摧毁大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技术作为人肆无忌惮地贯彻主观意图以追求最大利润的手段,最终会将大地置于毁灭的境地,但是,人在根本上是不能为所欲为的,于是,他选择艺术世界,强调诗意地栖居,并以此与技术世界进行艰难的抗争。

海德格尔企图以“诗意”对抗、克服和挽救现代资本主义技术至上造成的社会异化,这是一种审美的乌托邦化。马克思提出的“异化”从根本上找到了现代社会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共产主义是消除异化的手段:“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

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1]</sup>共产主义不但是这一扬弃的具体途径,而且是扬弃之后人的本质得以复归和人的主体性得以全面生成的新的社会形态。

按照历史规律,“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最终会实现,这点毋庸置疑。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构想,是立足于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极大富足的前提之上的。虽然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是人类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摆脱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我们现在既然看不到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而现实的世界又迫切需要我们做出改变,那么,我们何不从自己的传统中找到协调这种矛盾的东西呢?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们也信仰宗教,过自己的宗教生活,在他们那里,宗教已经仅限于道德和情感的领域,他们不再相信基督教的传统教义,但是却视基督为道德上的楷模,而且如康德所秉持的“在我头上是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那样把道德情感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科学代表着人的理性,而上帝则代表着人的良知,正像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中国人的心中一样。只要心中存在着善的信仰和敬畏之心,那么人或许能够摆脱由科技理性带来的痛苦,从而找出一条协调主体能动性与有限性的有效途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An Analysis on Subject's Initiative and Effect Limitation

SHEN F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Law&Poli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As a main body of cognitive and practice, it's always a question to be focused and to be solv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bject initiative and effect limitation.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freedom, subject must be analysed in a comprehensive and reasonable way. It is the key of the problem to find how to coordinate its initiative and limitedness through its development and derivation.

**Key words:** Subject; Initiative; Effect Limitation; Development and Derivation

(责任编辑:李 进)